

明清

安徽典籍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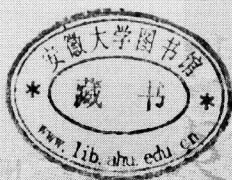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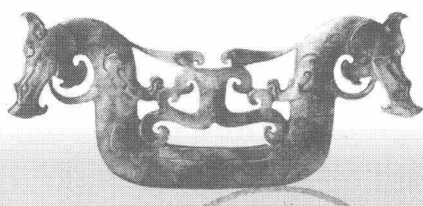


黄山书社

明清

安徽典籍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安徽典籍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编. —合肥:黄山书社,2005.9

ISBN7-80707-277-6

I. 明… II. ①中…②安… III. 历史—文献—安徽省—明清时代—学术会议—文集 IV. K29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845 号

明清安徽典籍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

*

责任编辑 李 媛

责任校对 张红一 封面设计 国 亮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3 字数 306 千字 印数 15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707-277-6

定价 23.60 元

凡发现本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大会开幕式主席台



原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心一(中)、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陆勤毅(左)、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周国林(右)



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致欢迎辞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周国林致开幕辞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 25 届年会的参会代表们

徽学与明清安徽典籍研究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5届年会代表合影

2004年9月17日于安徽大学



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安徽古籍丛书书目

已经出版(部分)

毛诗后笺(上下)

左传微

论语解注合编

孟子讲义

尔雅翼

说文假借义证

老子注三种

老子注译

定本庄子故

庄子论诂

杜诗说

唐诗评三种

张籍集注

包拯集校注

郭祥正集

东莱诗词集

张孝祥诗文集

张孝祥词笺校

朱子全书(二十七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翠微南征录北征录合集

秋崖诗词校注

明太祖集

朱枫林集

谿山公家议

阮大铖戏曲四种

田间易学

田间诗学

庄屈合诂

藏山阁集

田间诗集

田间文集

不得已 附二种

钝斋诗选

朱书集

古事比(上下)

绩学堂诗文钞

施愚山集(四卷)

方望溪遗集

青溪集

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

戴震全书(七卷)

惜抱轩诗集训纂

壹斋集(上下)

俞正燮全集(三卷)

康輶纪行·东槎纪略

识小录·寸阴丛录
包世臣全集(三卷)
王侍郎奏议
刘铭传文集
吴汝纶全集(四卷)
杨仁山全集
敬孚类稿
北山楼集
桐城耆旧传
文学研究法
旧闻随笔
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
疑庵诗
歙事闲谭(上下)
三余札记
青泥莲花记
舌华录
明语林
道听途说

兰荅馆外史
夜雨秋灯录·续录
皖人诗话八种
安徽出土金文订补
刘文典全集(四卷,特辑)
明实录安徽经济史料类编(列入附辑)
姚莹年谱(列入附辑)
弢翁藏书年谱(列入附辑)

即将出版

新论辑校
文选笺证
皖人戏曲丛刊·郑之珍卷
歙纪
咏怀堂诗集
一木堂诗集
钝斋文选
程瑶田全集(三卷)

目次

论皖派考据学的学术特点	郭康松	1
《孟子节文》与朱元璋的文化性格	赵庆伟	20
《大明志书》修纂及特点考论		
——兼论朱元璋的狭隘心胸	谢贵安	37
论《南雍志·经籍考》	徐有富	53
朱有燬著作考述	李慧玲	72
程敏政鬻题辨析	吕锡生	87
方孔炤和他的《全边略记》	王雄	93
吴应箕与《留都见闻录》	郑天一	100
钱澄之学杜论略	程美华	112
龚鼎孳杂考	张升	122
张英家训二书校记	杨寄林、董文武	139
张廷玉与雍正帝	陈浣	155
最早的澳门史著——《澳门纪略》	王酉梅、陈曦文	171
《文木山房诗说》的经学史价值新探	徐华	179
洪亮吉遣谪伊犁与其塞外杂著	郑志惠	189
略论凌廷堪的历史观念	李晓明	200
俞正燮与《俞正燮全集》	诸伟奇	212
俞正燮的人权意识及其妇女观评述		
——《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中妇女问题之文评析		
.....	徐适端	225

史学家夏燮的治史特点	崔曙庭	239
夏燮及其《明通鉴》、《中西纪事》	来可泓	249
从《治台必告录》看清代台湾海洋文化地域形态	赵君尧	253
“宛转随人盖九年” ——李鸿章的幕僚生涯	李志茗	269
建德周氏家族的文化遗产：以周馥、周学熙的诗集为中心	徐雁平	293
泾川朱氏及其家谱、藏书楼	李雄飞	320
宋元明清徽州“四书”类典籍叙录	杨昶	334
徽州地区郑姓源流略述	王铁	342
徽商与民间收藏的发展	沈振辉	349
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	汪受宽	369
试论明清徽商与徽菜的发展	刘朴兵	380
从《徐乃昌日记》考证《安徽丛书》编纂特点	李弘毅	391
评民国本《九华山志》	赵捷	407

论皖派考据学的学术特点

郭康松

皖派考据学是乾嘉考据学的主要流派，是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皖派考据学的学术特点，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乾嘉考据学，而且有助于对徽学学术传统与学术精神的把握。本文主要对乾嘉考据学的皖派与吴派相比较而言更具特色的主要学术特点作初步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关于皖派的划分问题

关于清代乾嘉考据学派内部的流派划分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传统的划分为吴派、皖派，有学者在吴派、皖派之外划分出扬州派，有学者划分为惠（栋）、戴（震）和钱（大昕）派三派^①，有学者按治经与治史两大类分为若干派^②，有的学者认为乾嘉考据学派是一个整体，其内部不必再作划分^③，他们认为：乾嘉考据学是同一个学术派别，其学者之间虽然有各自的风格与差异，但考据学者有基本一致的治学宗旨不必再作划分；以吴、皖地域划分成两派以及所谓吴派佞汉嗜古、皖派实事求是的概括也不完全符合

历史事实，而且被视为考据学者的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等并不是皖人。

我们认为同一大学术流派之下，存在不同的小派别，在学术史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拥有众多的共性，就因而忽视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同一大学术流派之下存在不同的小学派，正是学术兴盛的表现，也是学术得以健康发展的保证。吴派、皖派虽然具有基本相同的治学宗旨、治学方法和学术规范，但他们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清代学术的贡献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后世学者看得一清二楚，当时的学者也意识到两者的客观存在与他们的不同。王鸣盛曾记载说：

吾交天下，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也。

间与东原从容语：“子之学于定宇如何？”东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④

这说明，戴震本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学术追求与惠栋有所不同。考据学派的反对者袁枚在给惠栋的信中，也提到“吴门”的存在，他说：

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是也。

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⑤

江藩在总结经学史说：

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旦复。^⑥

他批评当时的一些学者重经而轻史的现象时，也明确地提到惠学与戴学之名，他说：

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⑦

对于吴派和皖派明确命名与划分，始于章太炎。他在《清儒》

中说：“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⑧此后的研究着大都沿用此说。

学派的划分第一要素应该是直接与间接的师承关系，第二是学术趋向，学派无论是以创始人、代表人的姓氏，还是以其地望来命名在学术史上都是常见的。同一学派的学者不必是同一地域的学者，例如洛学是以二程之所在地洛阳而得名，其后学中，刘绚是常山人，谢良佐是上蔡人，游酢是建州建阳人，杨时是南剑将乐人等，而同一地域的学者不一定属于同一学派。根据这一原则扬州派不必另立一派，因为“戴氏弟子，以扬州为盛，高邮王氏传其形声训诂之学，兴化任氏传其典章制度之学。仪征阮文达公，友于王氏、任氏，得其师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按：戴震之师江永）之再传”^⑨。钱大昕也不必从吴派中析出，因为他与惠栋有师从关系，“在吴门时，（钱大昕）与元和惠定宇、吴江沈冠云友，乃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⑩。

所以将清代考据学的全盛时期的乾嘉考据学派划分为吴派和皖派是有其依据的，基本反映了当时历史事实，本文所言之皖派以支伟成著，章太炎审定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所列之人物为依据。

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

如果说吴派的贡献是完全抛弃否定宋学，回归到汉代学术，构筑汉学森严的壁垒，那么皖派则在吴派的基础上，真正形成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治学精神。

针对经学的荒疏，考证学派中一部分人首先倡导以求古义的办法来克服宋人的玄言解经。清初的朱鹤龄云：“经学之荒世，荒于执

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⑩他想用古注来打破朱熹对经典阐释“一言堂”局面。“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因为宋儒解经多不依古注，所以他们把“信古”作为“求是”之路。这种“信古”的“求是”方法在吴派表现得尤为明显。乾嘉时期考据学中的吴派，抱有较深的“门户之见”。惠栋高举“汉学”的旗帜，“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完全抛弃魏晋以后的经说，一味寻求汉儒的经说，无论其精华与糟粕，一概视为金玉良言，不论是非。与宋代义理之学相反，惠栋治经，“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⑪。惠栋云：“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能废也。”^⑫汉代学者距经典形成时期相对较近，而且学有师承，训诂由经师口授相传，经师之说列于学官，要理解经书之原义，必须借助汉注，这种做法，有其一定合理性。他们“求古”的目的不是好古，而是为了“求是”，所以王鸣盛说：“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无是者也。”^⑬吴派学者多谨守师说，尊信汉儒。其中王鸣盛表现得较为典型。他极力主张尊郑，把郑玄视为经学的宗师，认为：“两汉经生崛起，传注麻列，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直至汉末有郑康成，方兼众经，自非康成，谁敢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使学者知所归乎？”王鸣盛为了阐扬郑学，“使世知有郑氏之注，并使世知有郑氏之学”，他“钻研群儒，爬罗剔抉，凡一言一字之出于郑者，悉甄而录之”^⑭。其目的是“发挥郑氏康成一家之学也。”^⑮他主张研究经学“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⑯存有较深的门户之见。钱大昕也认为“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大义犹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⑰与惠栋如出一辙。余萧客为惠栋弟子，笃守汉学营垒，其弟子江藩谨承师

教，以“汉学”为宗，为了宣扬“汉学”，撰写《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后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于嘉庆二十三年出版，江氏称其取去标准是“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固不著录”。吴派这种“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思路。是用汉之“旧权威”来替代宋明之“新权威”，与真正实事求是的精神相违，如果考据学派沿着这一思想发展下去，考据学就只能成为真正的“汉学”。以皖派为主的考据学者打出了“实事求是”的旗帜，对这种有限的“求是”提出了尖锐而有力的批判。《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惠栋云：“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代，其短亦在于泥古。”^⑨王引之则说得更客气：“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⑩皖派主师戴震对惠栋极其尊敬，但他所具有的怀疑、批判精神不允许他去走惠氏“佞汉”的老路，他力矫吴派墨守汉儒之弊，主张“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⑪。他认为：“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亦有博会，晋人博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⑫即从经典原文入手进行研究，探讨经典原意，不受前人观点的影响。他们注重古注古训是因为“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⑬。他针对吴派等惟汉儒是从的倾向批评说：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⑭

这里“能文章者”是暗指方苞等桐城派，“善考核者”则暗指吴派学者及追随者，所谓“株守先儒而信之笃”是指能文章的桐城派独信

宋儒朱子之学和善考核的吴派墨守汉儒之学。他说：

经自汉经师所授受，已差违失次，其所训释，复各持异解。

余尝欲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又广揽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⑥

戴震也很重视汉人的成果，但他只是将它们作为自己研究经书的资料 and 工具，而不是惟汉是求，凡汉皆好。从而开启了乾嘉考据学派真正意义上“实事求是”的学风。戴震的弟子亦继承了其师的观点，不以“汉学”自封，没有门户之见，不论汉宋，唯求其是。如王念孙承袭戴氏的训诂形声之学，无门户之见，他赞扬刘台拱说：“其于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一家，而唯是之求。”^⑦王引之亦反对“株守汉学而不求其是者”^⑧。他在《经义述闻序》中借用其父之语云：“说经期于得经义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稍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郑康成者矣。”以明其书的宗旨，也是对吴派墨守汉儒，唯汉是求的委婉批评。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⑨

重视小学，成就斐然

在我国古代学术划分中，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属于经学范围，本为经学的附庸。乾嘉诸儒治经，从小学入手，使小学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学问，蔚为大国。清初，顾炎武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顾氏的这一主张，成为考据学派的不二法门，所以清代考据学在小学方面的成就巨大，而皖派在重视小学研究和小学研究成果方面尤其突出。皖派创始人戴震以其既精通小学、历算、地理、名物又讲义理之学而影响了皖派乃至吴派的部分